

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的分组与演变关系

倪润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通过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讨论拓跋的起源问题。首先将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墓葬分为四组, 分析各组的文化因素和来源, 并与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 如平洋文化、红马山文化、布尔霍图伊文化、匈奴文化等, 借助已有研究在年代判断上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参照, 从而勾勒出各组间的时空框架和文化演变关系, 然后讨论嘎仙洞遗址在这一框架中的位置。提出嘎仙洞应视做红马山文化从东向西翻越大兴安岭过程中的遗迹之一, 不宜贴上拓跋发祥地的“标签”; 搞清楚平洋文化、红马山文化、布尔霍图伊文化的族属和相互关系, 对推进拓跋族源和发祥地问题的解决是十分关键的。

关键词: 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 拓跋起源; 族源; 发祥地

《魏书·序纪》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 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 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其后, 世为君长, 统幽都之北, 广漠之野, 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 淳朴为俗, 简易为化, 不为文字, 刻木纪契而已, 世事远近, 人相传授, 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 北俗谓土为托, 谓后为跋, 故以为氏。”¹这段文献对拓跋鲜卑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表述, 提出两条观点: 一是拓跋的族源为黄帝, 二是拓跋的发祥地在大鲜卑山。长期以来, 众多学者围绕着这两条观点的真实性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 聚讼纷纭。在考古学介入其中后, 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的考古遗存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 这与其中两处遗存的引人注目颇有关系。

1、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墓地²被认为属于拓跋鲜卑早期遗存。

关于扎赉诺尔墓地的族属, 1961 年发掘整理者郑隆的意见是“应属于东汉末鲜卑族的一支”³; 同时, 黄展岳提出另一种意见, 认为“属于较典型的匈奴文化遗物”⁴; 1964 年, 安志敏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属于鲜卑人的论点, 也不能肯定属于匈奴人”⁵。1977 年, 宿白推测扎赉诺尔墓群“大约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 厥土昏莫沮洳’前后的遗迹”⁶。1979 年, 李逸友进一步论证扎赉诺尔古墓为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遗迹⁷。此后, 宿、李的观点为人普遍接受。

2、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⁸被视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

马长寿最早提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在大兴安岭北段⁹, 这一观点由于嘎仙洞祝文刻石的发现而近乎定论。1980 年, 米文平在嘎仙洞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中书侍郎李敞来此告祭时所刻下的祝文, 且与《魏书·礼志》的载文基本相符, 由此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 大鲜卑山就在这里¹⁰。米文平的发现很快引起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佟柱臣¹¹、干志耿¹²、宿白¹³、夏鼐¹⁴等都在论文中先后表示认同, 肯定鲜卑石室的发现解决了鲜卑族的发源地问题。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还吸收了米文平的有关论点, 新增了鲜卑石室和大鲜卑山的标注, 乌洛侯、地豆于等方位也据以修订¹⁵。

以扎赉诺尔墓地、嘎仙洞遗址为中心, 对其附近的遗存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是进一步探索拓跋起源问题的关键。这样一来, 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考古遗存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除扎赉诺尔墓地、嘎仙洞遗址外, 目前发现的其他遗存都是墓葬, 包括陈巴尔虎旗完工

墓地¹⁶，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车站墓地¹⁷、孟根楚鲁墓地¹⁸，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墓地¹⁹、七卡墓地²⁰，新巴尔虎旗伊和乌拉墓地²¹，海拉尔区团结墓地²²等。这九处遗存中，八处墓葬都在大兴安岭西侧，惟有嘎仙洞遗址在大兴安岭东麓。

本文首先对地域更为相近的八处墓葬进行分组研究，分析各组的文化因素和来源，并与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借助已有研究在年代判断上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参照，从而得出各组间的发展演变关系。

这八处墓葬可分为四组。

A组 完工组，包括完工、伊敏车站等处墓葬。

完工位于海拉尔河南岸，西距海拉尔市约60公里，其西南约0.5公里处发现一处墓地。1958年在该处发现人骨架和马骨架，1961年发现两座墓葬，1963年又发现墓葬四座（编号分别为M1A、M1B、M2、M3，M1A、1B实际为同一座墓，M1A是M1B的二层台）。这几座墓葬的基本形制均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木棺，实行多人葬，殉葬马、牛、狗；随葬品中，陶器有鬲、罐、壶和三耳鸭形器等，石器有刮削器、镞、瑱等，骨器有镞、锥、珠、鸣镝、弧状器、长条形器、牛角形器、尖状器及饰片等，铜器有带饰、带扣、扣、铃、环等，铁器有刀、环、带扣等，金银器有金片饰、银耳坠、银碗等，蚌器有蚌饰、贝饰、小海螺等，玉石器有绿松石饰、白石饰、滑石饰、玛瑙饰、珊瑚枝饰等，桦皮器有器皿底盖等，漆器残片在桦树皮外涂朱漆并绘黑色花纹，另发现丝绸、麻布、皮带、皮革等。

伊敏车站位于伊敏河左岸，1979年在其西北0.5公里处，清理墓葬四座。由于破坏较甚，形制不详，实行单人葬，殉葬马、羊、狗的头、蹄；随葬品有陶壶、铁马衔、铜饰针、铜扣、银扣、骨镞、海贝、串珠等。M4中出土双耳红衣陶壶一件，在完工63M1B中有类似陶壶发现。这些墓葬所出的海贝、骨镞、铜扣等也与完工墓葬大致相同。因此，伊敏车站墓葬应与完工墓葬的文化性质相近，归为同组墓葬。

本组墓葬所出陶器主要分为两群，分别反映平洋文化和匈奴文化的因素²³。

第一群 反映平洋文化因素的陶器。

平洋文化的代表性遗存是平洋墓葬（包括砖厂和战斗两个墓地），其他内涵相同的有齐齐哈尔三家子、东土岗、杜尔伯特官地、通榆兴隆山墓葬、松原后土木墓葬，以及富裕小登科、齐齐哈尔老龙头、大安东山头的部分墓葬等²⁴。该文化的年代下限已进入西汉时期²⁵。

长颈壶：鼓腹，平底。可分两型。

A型 斜直颈，无耳。如完工1961年墓葬出土1件以及63M1B：62（图一：1-2）。砖厂墓地M111、兴隆山墓葬有相似陶壶（图一：3-4）。

B型 竖直颈，肩部施横双耳，红陶衣。如完工63M1B：72，以及伊敏车站墓葬出土的1件（图一：5-6），具有与三家子采：5（图一：7）一样的特点。

短颈壶：曲颈，侈口，无耳，平底。可分两型。

A型 横鼓腹。如完工63M1B：80（图一：8）与砖厂M104：9、三家子M2：1特点相同（图一：9-10）。

B型 折腹。如完工63M1B出土三件，两件完整的为63M1B：75和77（图一：11-12），与三家子M1：8的折腹特点相近（图一：13）。

鸭形壶：如完工63M1B：74（图一：15），与三家子采：8、兴隆山墓葬的出土1件、砖

厂 M170: 1 (图一: 16-18) 相似。

鬲: 如完工 63M1B: 60 (图一: 14), 小口、篦点格形纹, 形体较高瘦, 形制上与平洋墓葬出土的形体矮胖的大口鬲迥异, 但在纹饰上, 则与砖厂 M170: 1 鸭形壶的纹饰很相近 (图一: 18)²⁶。

在以上例证中, 通榆兴隆山墓葬出土九枚五铢钱, 皆为汉武帝时铸造, 简报撰写者由此判断该墓的年代可能是西汉中晚期²⁷。汉武帝时期属于西汉中期, 把该墓年代定得较晚一些, 大概是考虑了五铢钱使用时间会较长的因素。以此墓为基点, 可推证其他出土相似平洋文化陶器的墓葬, 包括完工组墓葬, 年代也相当于西汉中晚期。因此, 完工组第一群陶器反映的是西汉中晚期阶段平洋文化的特点。

第二群 反映匈奴文化因素的陶器。

完工墓葬出土两件长颈陶壶和两件短颈陶罐, 以器表饰竖向摩擦暗纹, 肩部饰弦纹、波浪纹或戳印纹为特征 (图二: 2、5、8、9)。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遗存中, 具有这种纹饰特征的陶器很常见, 伊沃尔加墓地和德列斯图依墓地可见到与完工这四件陶器几乎完全相同的器形 (图二: 1、3、4、7); 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的很多陶器底部有印记 (图二: 6), 其形状与风格同完工 1961 年墓葬出土那件短颈陶罐底部的印记极其相似 (图二: 5)²⁸。基于对完工组墓葬年代的推定, 可认为第二群陶器反映的是西汉中晚期外贝加尔地区匈奴文化的特点。

B 组 拉布达林组, 包括拉布达林墓葬、七卡墓葬、伊和乌拉 M1 等。

拉布达林墓葬分布在根河南岸拉布达林镇小西山的东南坡上, 1987 年调查、清理 3 座墓葬, 1992 年再次发掘墓葬 24 座。这些墓葬的基本形制均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多数设有葬具, 以木棺为主, 有的墓葬在墓坑上覆盖石板, 流行单人葬, 殉葬马、牛、羊、猪的头、蹄; 随葬品中, 陶器有罐、壶、尊、钵、碗等器形, 桦皮器有罐、壶、筒、弓囊、箭囊、人形饰和明器等, 骨器有镞、弭、扣、弓把、刀把、锥、针、簪、带孔板、弧形器、钻孔羊距骨、喇叭状角饰、鸣镝、管形饰等, 铜器有镜、铃、扣、镞、镮、环、饰件、“大泉五十”钱等, 铁器有棺钉、环、带扣、镞、刀、矛、马衔等, 金器有耳坠, 石器有镞, 玉石器有绿松石饰、玛瑙饰、滑石饰等, 蚌器有管形饰, 另外还有木制品、丝织物、毛毡等。

七卡墓葬位于拉布达林西北约 80 公里、七卡生产队西 200 米的山南坡下侧, 西距额尔古纳河约 1 公里, 1998 年清理残墓 2 座, 1990 年清理残墓 3 座。这 5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无葬具, 墓坑下半部填土、上半部填石块, 全为单人葬, 殉葬有马蹄; 随葬品中, 陶器有罐、杯等, 骨器有镞、扣、坠、鸣镝, 铁器有马衔、带扣、刀, 铜器有耳环, 桦皮器有器皿底盖等。

伊和乌拉 M1, 1996 年发现于新巴尔虎旗伊和乌拉山西南的一沙坑内,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无葬具, 单人葬, 殉葬有牛头、牛蹄和两件陶罐。

本组遗存所出陶器的主体反映的是红马山文化的要素, 应属红马山文化的范畴。据研究, 目前归为红马山文化的遗存包括大兴安岭东侧嫩江上游讷河市境内的二克浅晚期墓葬²⁹、库勒浅晚期墓葬³⁰、红马山遗址、兔子地遗址, 以及嫩江县境内的铁古拉遗址等, 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³¹。拉布达林组陶器与上述红马山文化遗存多有相似之处, 试比较如下。

杯: 敞口, 斜腹壁, 平底。分为两型。

A 型 腹中部施有单耳。如拉布达林 92M7 出土一件 (图三: 1), 与库勒浅 M29 上: 3、二克浅 85NEM24: 8、红马山 H64: 2 的特征相似 (图三: 2-4)。

B 型 无耳。如拉布达林 92M20 出土一件（图三：5），与二克浅 2001NEM1：2 有相似之处（图三：6）。

钵：鼓腹，敛口，平底。如七卡 M1：1（图三：7），与库勒浅 T302②：1 的特征接近（图三：8）。

广口罐：口径大于或略小于腹径，平底。分为四型。

A 型 筒腹，腹壁较直，素面，侈口。如拉布达林 92M6、92M13 出土的两件（图三：9-10），与红马山 H57：3（图三：11）的特征相似。

B 型 鼓腹，素面，侈口。如拉布达林 92M5 出土的一件（图三：12）、伊和乌拉 M1：1（图三：13）和伊和乌拉 M1：2（图三：14）。它们和兔子地 H34：1（图三：15）有相似点。

C 型 纵长鼓腹，方唇，外观似盘口。可分为两亚型。

Ca 型 口沿外侧施戳点纹，如七卡 M3：1（图三：16），它和红马山 H104 出土的残罐口沿相似（图三：17），拉布达林墓葬也出土这种特征的陶罐。

Cb 型 素面。如拉布达林 87M2 出土的一件（图三：18）。

D 型 纵长鼓腹，直口，口部外侧施一周附加堆纹。如拉布达林 92M19 出土的一件陶罐（图三：19）。这种特征的陶罐亦见于兔子地遗址（图三：20）。

双耳壶：侈口，颈部施竖双耳，鼓腹，平底。如拉布达林 87M2 出土一件（图三：21），红褐色，与上腹至口施红衣的二克浅 85NEM24：10（图三：22）特征很相似。

本组遗存年代的推断，主要依据出土的铜镜和铜钱。拉布达林 92M5 出土一件铜镜残片（图四：1），内圈有一周残存文字，内容为“而日之月而”；西安地区新莽时期 1997FXCM22 出土了一件同样的完整铜镜（图四：2），其内圈文字为“内而青而以昭而明，光而象夫而日之月，而三而不泄”³²。这表明拉布达林 92M5 所出的是新莽时期的昭明镜。拉布达林 92M6 出土一件铜镜残片（图四：3），仅余外圈纹饰，从外至内依次为双线锯齿纹、单线锯齿纹、斜短线栉齿纹各一周。这种纹饰所见的其他铜镜例子，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之间，如西安 2000SYTFM94 出土的鸟纹博局镜（图四：4），这种镜出现于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为最盛期³³；又如朝鲜平壤出土的“居摄元年”连弧铭带镜（图四：5）³⁴，居摄为西汉孺子刘婴年号，即公元 6 年，属西汉末年，离新莽建国只差 3 年；再如洛阳出土新莽时期四神博局镜（图四：6）³⁵、湖南资兴东汉早期墓出土四神博局镜（图四：7）³⁶等。拉布达林 92M24 出土 5 枚铜钱，均为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图四：8）。对以上遗物年代的分析，比较统一地指向新莽前后。另外，拉布达林墓地 1992 年发掘的 24 座墓，可划分为北、中、南三个墓区，在各墓区内，墓葬分布比较集中，相互不迭压（图五），表明各墓区内墓葬的年代应接近；而 92M24 是北墓区 7 座墓葬之一，92M5、M6 是中墓区 13 座墓葬中的两座。因此，我们认为拉布达林墓地的总体年代大致在新莽时期至东汉早期。

C 组 扎赉诺尔组，包括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团结等处墓葬。

扎赉诺尔墓地位于扎赉诺尔矿区南约 7.5 公里的木图那雅河（俗称圈河）东岸坡地上，1959、1960、1984、1986、1994 年先后进行了 5 次考古发掘和清理，共清理墓葬 56 座。这些墓葬的基本形制均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普遍发现木棺葬具，绝大多数为单人葬，殉葬牛、马、羊的头、蹄；随葬品中，陶器有罐、壶、钵、碗、尊等，铜器有钺、飞马纹饰牌、奔马纹饰牌、三鹿纹饰牌、人形纹饰牌、羊形饰牌、锯齿形垂饰、带扣、耳坠、镯、钏、戒指、环、泡、镜等，铁器有矛、镞、衔、刀、剑、鞘等，骨器有镞、弭、簪、钗、衔、锥、带扣、角器、鸣镝、刀把、饰板、饰件、弧形器、羊距骨等，木器有勺、弓、梳、珠饰、梭形器、

条形器等，桦皮器有器皿底盖、壶、盒、弓囊等，玉石器有玉环、玉片、玉珠、石球、石饰牌、砺石、煤精饰牌、煤精管饰、琥珀饰、琉璃饰、绿松石饰、玛瑙饰、水晶饰等，另外还有漆器、贝壳、丝织品等。

1980年，在伊敏河右岸两处地点发掘墓葬7座，分别在原孟根楚鲁公社所在地北一公里和二十公里处，前一处发掘了M1，后一处发掘了M2-M7。这些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设有二层台，有的有木葬具，全为单人葬，殉葬牛、马、羊的头、蹄；随葬品中，陶器有罐，金器有耳坠、头饰、项圈，铜器有镯，铁器有矛、镞、刀、镞、穿、甲片、带钩、马衔等，骨器有镞、刀、扣、鸣镝、弧形器等，玉石器有石管、琉璃饰、琥珀饰、绿松石饰等。

团结墓地位于海拉尔区哈克镇团结村西约0.5公里处的海拉尔河南岸的台地上，2001年经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7座，另采集到陶器5件。这些墓葬的形制基本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单人葬，殉葬牛、马、羊的头、蹄；随葬品中，陶器有罐，铁器有镞，铜器有耳饰，玉石器有琥珀饰、萤石珠、玻璃珠等。

本组墓葬所出陶器主要分为三群，分别反映了红马山文化因素、布尔霍图伊文化因素和平洋文化因素的遗绪。

第一群 反映红马山文化因素的陶器。

杯：敞口，斜直腹壁，平底。如1960年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一件（图六：1），具有与二克浅2001NEM1：2相似的特征（图三：6）。

钵：鼓腹，敛口，平底。如1960年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一件（图六：2）、86M3006：7（图六：3），其特征与七卡M1：1接近（图三：7）。

广口罐：口径大于或略小于腹径，平底。分为两型。

A型 纵长鼓腹，方唇，外观似盘口。分为两亚型。

Aa型 口沿外侧施戳点纹。如扎赉诺尔60M28出土的一件（图六：4）、84M4出土的一件（图六：5）和86M3009：1（图六：6），均与七卡M3：1相似（图三：16）。

Ab型 素面。如扎赉诺尔84M2出土的1件（图六：7），与拉布达林87M2出土的1件相似（图三：18）。

B型 纵长筒腹，敞口，素面。如扎赉诺尔86M3012：5、86M3013：1（图六：8-9）。这种罐是对红马山H138：3（图六：10）器形的继承和发展。

双耳壶：直颈，颈部施竖双耳，平底。如扎赉诺尔86M3014：4（图六：11），与二克浅2001NEM11：1（图六：12）相似。

第二群 反映布尔霍图伊文化因素的陶器。

“布尔霍图伊文化”的命名是由苏联学者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提出。后来该文化内涵不断扩大，成为对东外贝加尔地区鄂嫩河-石勒喀河流域公元第1千纪墓葬遗存的笼统命名，包括多种各具特点的文化类型及其变体，涵盖了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墓葬文化。已有研究者指出外贝加尔地区布尔霍图伊文化的主体显然应同中国一侧的早期拓跋鲜卑遗存密切相关³⁷。在俄罗斯学者著述的《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的游牧民族》一书中，列举了六幅布尔霍图伊文化墓葬出土陶器的图版（以下简称外贝加尔图版）³⁸，其中相当一部分陶器的特点与扎赉诺尔组所出陶器相似或相同，试做一比较。

甗形罐：纵长腹。可分为五型。

A 型 侈口，尖圆唇，口沿外侧施戳点纹一周，假耳，圈足。如 1959 年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一件（图七：1），外贝加尔图版中与其口、足特征相似的陶器见于图版叁：2、图版肆：8（图七：2-3）等。

B 型 侈口，叠唇，口沿外侧施戳点纹一周，单耳，圈足。如 1959 年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一件（图七：4）、扎赉诺尔 60M10 出土的一件（图七：5）。外贝加尔图版肆：7（图七：6）的口、足特征与之相似。

C 型 方唇，外观似盘口，双耳，圈足。如扎赉诺尔 84M3 出土的一件（图七：7），外贝加尔图版陆：13（图七：8）的口、足特征与之相似。

D 型 侈口，圆唇，肩部施戳点式附加堆纹一周，圈足。如孟根楚鲁 M7：2（图七：9），与外贝加尔图版肆：9（图七：10）的足部特征和肩部饰泥条式附加堆纹的做法具有可比性。

E 型 侈口，圆唇，下腹部斜收，小平底。分为两亚型。

Ea 型 肩部施戳点式附加堆纹一周。如孟根楚鲁 M3：1（图七：11）、团结 HTM5：1（图七：12）、团结 HTM7：1（图七：13），可与外贝加尔图版叁：1（图七：14）、图版叁：6（图七：15）的口、底部特征和肩部饰泥条式附加堆纹的做法比较。

Eb 型 素面。如团结 HTM6：1（图七：16）。

广口罐：侈口，口径大于或略小于腹径，纵长鼓腹，平底。可分为五型。

A 型 叠唇，口沿外侧施戳点纹一周。如扎赉诺尔 86M3002：9（图八：1）、86M3007：1（图八：2），与外贝加尔图版叁：7（图八：3）、图版陆：12（图八：4）相似。

B 型 尖圆唇，口沿外侧施戳点纹一周。如 1959 年扎赉诺尔出土的两件：一件腹部为素面（图八：5），外贝加尔图版壹：6、图版壹：8、图版贰：6、图版贰：4、图版贰：5、图版贰：7 与之相似（图八：7-12）；另一件腹部饰有鼻耳和对称附加堆纹（图八：6）。

C 型 尖圆唇，素面。如扎赉诺尔 86M3011：3（图九：1）、94M2：1（图九：2）、60M20 出土的一件（图九：3）、孟根楚鲁 M2：1（图九：4）、团结 HTC：1（图九：5），与外贝加尔图版叁：8、图版叁：10、图版伍：3 相似（图九：6-8）。

D 型 尖圆唇，肩部饰弦纹一周。如团结 HTC：2（图九：9）。外贝加尔图版壹：1、图版贰：3、图版贰：8（图九：10-12）除在口沿外侧施戳点纹一周外，其他特征与之相同。

E 型 圆唇，肩部施戳点式附加堆纹一周。如团结 HTC：3（图九：13）。外贝加尔图版贰：2、图版壹：4、图版壹：2 均有在肩部施附加堆纹的做法（图九：14-16）。

双耳罐：纵长鼓腹，双耳饰于颈部，平底。分为两型。

A 型 素面。1959、1960 年扎赉诺尔墓葬各出土一件（图十：1-2），与外贝加尔图版陆：16 相似（图十：3）。

B 型 肩部施戳点式附加堆纹一周。如团结 HTM1：1（图十：4）。

中口罐：侈口，口径明显小于腹径但大于或接近底径，短颈，鼓腹，平底，肩部施戳点式附加堆纹一周。如团结 HTC：5、HTM5：2、HTC：4（图十：5-7），外贝加尔图版壹：9（图十：8）除纹饰外，整体器形与之相似。

第三群 反映西汉平洋文化遗绪的陶器。

本群陶器具有平洋文化陶器的部分特征，但器形上已发生了较多变化，应是西汉中晚期

平洋文化影响呼伦贝尔地区之后，在当地的遗留因素所致。如扎赉诺尔 86M3013: 3（图十一：1）的折腹特征，与完工 63M1B: 75 相似（图十一：4）；扎赉诺尔 84M4 出土的一件陶罐（图十一：2）所具有的斜直颈特征，与小登科 85FMX101: 1 相似（图十一：5）；扎赉诺尔 84M3 出土的一件直颈、鼓腹陶壶（图十一：3），与三家子 M3: 9 相似（图十一：6）。

本组遗存提供了如下一些相关的年代信息：扎赉诺尔墓地 1959 年的发掘中，出土一面残铜镜，为八乳四神博局镜；该类铜镜出现于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为最盛期，东汉中期以后逐渐退化、减少³⁹。扎赉诺尔墓地第三群陶器是平洋文化的遗绪，年代当在西汉晚期之后。扎赉诺尔墓地第一群陶器，是受到拉布达林组的红马山文化影响而出现，其年代应稍晚于拉布达林墓地，大致可到东汉早期；从甗形罐由圈足向平底演变趋势看，这群陶器有较长的发展时期，较晚的遗存或可至东汉中晚期。总体看来，本组遗存主要集中的时段为东汉早期，可晚至东汉中晚期。

D 组 伊和乌拉 M2 组。目前仅此一座墓葬。

伊和乌拉山西南沙坑内发现的 M2，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葬，殉葬牛头、马头，随葬陶器 2 件、半环状金饰品 1 件、铁马衔 1 件、铁腰刀 1 件。

广口罐：出土一件（图十二：1），侈口，口径略大于腹径，鼓腹，平底，口沿外侧饰戳点纹一周，与伊和乌拉 M1: 1（图三：12）器形相似。

鼓腹壶：出土一件，即 M2: 1（图十二：2），侈口，平沿，舌状唇，鼓腹，平底，颈部饰竖向磨光暗纹，腹部饰滚轮压印的几何纹，与六家子墓地⁴⁰、舍根文化墓葬⁴¹所出展沿陶壶（图十二：3-5）的器形、纹饰特点相同。

六家子墓地、舍根文化墓葬所出展沿壶是早期东部鲜卑的遗存，年代为东汉晚期至西晋⁴²，伊和乌拉 M2 的年代可与之相当。

综合上述分组和相应的年代分析，可勾勒出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墓葬的时空框架和文化演变关系。

西汉中晚期：以完工组墓葬为代表，分布在海拉尔河南侧地区，反映了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文化与来自大兴安岭东侧的平洋文化在该地区接触的情况。

新莽时期至东汉早期：以拉布达林组墓葬为代表，分布在海拉尔河北侧地区，属于来自大兴安岭东侧的红马山文化。

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以扎赉诺尔组墓葬为代表，分布在海拉尔河南侧地区，主要文化因素是来自海拉尔河以北地区的红马山文化和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布尔霍图伊文化，同时也包含了此前平洋文化在当地的遗留因素。

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以伊和乌拉 M2 组墓葬为代表，反映来自大兴安岭东侧的东部鲜卑文化对海拉尔河地区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嘎仙洞遗址在上述框架中的位置，这对解决关于该遗址性质日益增多的争议是十分重要的。自米文平在嘎仙洞发现北魏祝文刻石后，似乎拓跋发祥地的问题就可以尘埃落定了。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反对的意见不断增多起来。最先提出异议的是台湾学者康乐，他认为根据目前所得资料，顶多只能说嘎仙洞是五世纪时的拓跋人所认为的祖先原居地；就算拓跋人的祖先曾经在此一山洞停留过，也不能就此认定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⁴³。90 年代以后，大陆学者也开始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如陶克涛⁴⁴、张博泉⁴⁵、李志敏⁴⁶、杨军⁴⁷等。张博泉指出以嘎仙洞中的北魏刻石为据断定拓跋鲜卑的“祖宗之庙”和起源地，忽视了文献记载的真伪考证，从而以误为真得出看法。李志敏认为《魏

书》以嘎仙洞为“国家先帝旧墟石室”的说法，应该是由乌洛侯居民关于当地嘎仙洞的神话传说故事附会而成的。这些争议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仅想依靠史籍文献和刻石文字一锤定音尚不能完全服众，需要对嘎仙洞内的考古遗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给它一个准确的定性。

1980 年对嘎仙洞的试掘，开了四条探沟和两条保护沟。探沟地层分为三层：第1层出土少量陶片和兽骨、不见细石器；第2层多出陶片和少量的细石器，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以黑褐陶敞口罐为主，亦有少量直口罐，不见壶、瓶、盆、碗等；第3层出土遗物以细石器为主，无陶器和其他器物，所出动物骨骼均为全新世野生动物。简报认为第3层可能属中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第2层属早期鲜卑文化层。⁴⁸从发掘情况看，嘎仙洞内的考古遗存并不丰富，而且从单纯的细石器文明到较成熟的陶器文明，其间的年代缺环较大，因此，这不像是一个有较大族群曾经长期连续居住过的遗址。

进一步对嘎仙洞出土的敞口罐和直口罐做型式分析和相关比较如下。

敞口罐，本文称广口罐，可分为三型。

A 型 侈口圆唇，素面。如图十三：1、3、5，分别与红马山 H138：3（图十三：2）、红马山 H78：1（图十三：4）、兔子地 H34：1（图十三：6）相似。

B 型 侈口圆唇，口沿外侧有一周泥条附加堆纹。如图十三：7，与兔子地 H13 出土的一件陶罐口沿残片（图十三：8）相似。

C 型 侈口方唇，外观似盘口，口沿外侧有一周戳点纹。如图十三：9，与红马山 H104 出土的一件陶罐口沿残片（图十三：10）相似。

直口罐，可分为两型。

A 型 口沿外侧有一周泥条附加堆纹。如图十三：11，与红马山 H58 出土的一件陶罐口沿残片（图十三：12）相似。

B 型 口沿外侧有一周圆点状附加堆纹。如图十三：13，与兔子地采集的一件陶罐口沿残片（图十三：14）相似。

从比较的结果看，嘎仙洞遗址第2层应属于红马山文化的范畴。再结合这个遗址非长期居住的情况，我们认为嘎仙洞应视做红马山文化从东向西翻越大兴安岭过程中的遗迹之一。它是嫩江上游流域红马山文化影响的结果，形成于拉布达林组墓葬之前，年代也早于扎赉诺尔组墓葬，但不是扎赉诺尔组墓葬的最早源头，不宜贴上拓跋发祥地的“标签”。

因此，拓跋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不能再胶着在嘎仙洞上，而要更为广泛地研究大兴安岭两侧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如果把扎赉诺尔组墓葬作为拓跋鲜卑遗存，那么搞清楚平洋文化、红马山文化、布尔霍图伊文化的族属和相互关系，对于推进拓跋起源问题的解决就是十分关键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从拓跋到北魏的墓葬考古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C780001）研究成果。

注 释

¹ 《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
- ²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³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 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88、135页。
- ⁵ 安志敏：《关于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文物》1964年第5期。
- ⁶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 ⁷ 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28-331页。
- ⁸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1980年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44-452页。
- ⁹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 ¹⁰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米文平：《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 ¹¹ 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 ¹² 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 ¹³ 宿白：《“鲜卑”考古的提出和近期的发展》，《檀原考古学研究所纪要《考古学论考》第10册，奈良县立檀原考古学研究所，1984年，第1-5页。
- ¹⁴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 ¹⁵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66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6-59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40-41、67页标注“大鲜卑山”，第四册第3-4、17-18、19-20、21-22页标注“石室”，地图出版社，1982年。
- ¹⁶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年第11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 ¹⁷ 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2期，1982年。
- ¹⁸ 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2期，1982年。
- ¹⁹ 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年第10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84-396页。
- ²⁰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七卡鲜卑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57-460页。
- ²¹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新巴尔虎旗伊和乌拉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53-456页。
- ²² 陈凤山、殷焕良、白劲松、李明忠：《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第一章，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 ²³ 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9期。该文中，潘玲认为完工墓葬既有汉书二期文化的因素，又有西汉匈奴文化的因素。这里所指的汉书二期文化，从文中所举的例证看，实际上属于通常所认为的平洋文化。而且，潘玲主张将平洋文化、汉书二期文化视为同一文化（潘玲、林沅：《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 ²⁴ 张伟：《松嫩平原战国两汉时期文化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相关遗存的出处分别是：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洋墓葬》，文物出版社，1990年；黑龙江省博物馆、齐齐哈尔市文管站：《齐齐哈尔市大道三家子墓葬清理》，《考古》1988年第12期；齐齐哈尔市文物管理站：《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土岗青铜时代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4期；赵善桐：《黑龙江官地遗址发现的墓葬》，《考古》1965年第1期；中渚、

- 相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郑新城：《吉林松原市后土木村发现古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张泰湘、曲炳仁：《黑龙江省富裕小登科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考古》1984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小登科墓葬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安东山头古墓葬清理》，《考古》1961年第8期，等。
- ²⁵ 潘玲、林沅：《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 ²⁶ 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9期。
- ²⁷ 中澍、相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 ²⁸ 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9期。
- ²⁹ 安路、贾伟明：《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考古》2003年第2期。
- ³⁰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库勒浅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考古》2006年第5期。
- ³¹ 张伟：《红马山文化辨析》，《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 ³²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114、116-117页。
- ³³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3、135、138页。
- ³⁴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41页。
- ³⁵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96页。
- ³⁶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 ³⁷ 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
- ³⁸ И·В·阿谢耶夫、И·И·基里洛夫、Е·В·科维切夫 著，王德厚、高秀云 译：《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的游牧民族》，《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出版，1996年6月。
- ³⁹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 ⁴⁰ 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 ⁴¹ 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
- ⁴² 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10-314页。
- ⁴³ 康乐：《鲜卑石室的发现》，台湾《历史月刊》1988年第5期；后收入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5页。
- ⁴⁴ 陶克涛：《论嘎仙洞刻石》，《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陶克涛：《毡乡春秋·拓跋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6、207、70页。
- ⁴⁵ 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鲜卑历史的研究》，同氏著《鲜卑新论 女真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68页。
- ⁴⁶ 李志敏：《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志敏：《关于〈魏书〉两个重要地名地望的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 ⁴⁷ 杨军：《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 ⁴⁸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1980年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44-452页。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Han Dynasty in HuLunBeiEr

NI Run-a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origin of Tuoba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Han dynasty in HuLunBeiEr. Firstly, the Han tombs in Hulunbeier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he cultural factors and sources in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other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such as the Pingyang culture, the Hongmashan culture, the Buerhuotuyi culture and the Hun cul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ketched out the framework of space-time relation and cultural evolution among the four groups, and then discussed the location of the Gaxian Cave site in this framework. In conclusion, the Gaxian Cave site was only one of many remains of Hongmashan culture crossing the Daxinganling Mountains from east to west. We should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ingyang culture, the Hongmashan culture and the Buerhuotuyi cultur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about the origin of Tuoba further.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Han dynasty in HuLunBeiEr ; origin of Tuoba; race source; original region